

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

刘晓凤¹, 葛岳静^{*1,2}, 赵亚博¹

(1.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 中国 北京 100875;

2. 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国家距离是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文章综合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和与全球连接等方面的国家距离, 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关系。发现: ①中国企业对沿线投资设厂的区域差异较大, 规模从大到小依次为: 东南亚、蒙俄、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中东欧。②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与中国OFDI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③除全球连接距离对中国OFDI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外, 其他国家距离都表现为负向作用, 其中经济 and 外交距离的负向作用最显著。文章认为对沿线投资应以国家距离为参考, 找准投资着力点, 并积极缩小地缘距离, 以节约投资成本, 克服投资阻力。

关键词: 国家距离;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投资区位选择; 中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 F11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2017)11 - 0099 - 10

DOI: 10.15957/j.cnki.jjdl.2017.11.013

National Distance and Chinese Companies' Choice of Loca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IU Xiaofeng¹, GE Yuejing^{1,2}, ZHAO Yabo¹

(1.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opolitical Setting of Southwest China and Borderland Develop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behavior of Chinese companies. Both the completion of overseas investment policy system and the deep promotion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help Chinese companies to go out. Amo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choice on where to put their money, national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one that draws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paper comprehends several national distance factors from th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cultural, economic, political, knowledgeable, diplomatic and global connective, describ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national dista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discussing if and how these distance factors influence Chinese Companies' Choice of Loca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irst, we build a model of several distance varieties with their index to analyze what effects that these kinds of distance have on the companies' invest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econd, we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value of different kinds of distance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tical method and describe their spatial pattern. Third, we build a regression equation using the indexes to examine and compa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kinds of distanc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direct investment amount and overseas companies amount betwee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vary a lot. The regions can be ordered according to the investment scale from large to small as: South East Asia, Mongolia and Russia,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Middle Asia, South Asia, Middle and East Europe. The most important 10 countries that Chinese companies inves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Singapore, Russia, Indonesia, Kazakhstan, Laos, United Arab Emirates, Myanmar, Pakistan, India and Mongolia. (2)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national geo-distance present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hinese OFDI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3) Except that global connective distance has a non-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OFDI, the other 6 distance factor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it, and economic distance and diplomatic distance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收稿时间: 2017 - 03 - 20; 修回时间: 2017 - 06 - 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41);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开放课题

作者简介: 刘晓凤(1994—), 女, 山东青岛人,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liuxf@mail.bnu.edu.cn。

※通讯作者: 葛岳静(1963—), 女, 北京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ge yj@bnu.edu.cn。

effect. Especially, economic distance and diplomatic distance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companies' choice of loc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 discovered in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irst,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initially focus on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ich have shorter geo-distance with China, thus they can save investment costs. Second, based on the effect of national distances, we can evaluat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n build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risk warning system for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Third, try to shorten the dista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specially diplomatic distanc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operation platforms lik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and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o conquer the barriers set by different kinds of distances and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national distance; the Belt and Roa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nvestment location selection; Chinese companies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谋求地区均衡发展 with 外交均衡结构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它开创了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的新模式^[1],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2],其提出后迅速成为地缘政治学、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投资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加快推进、多双边务实合作深入推进、对外投资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等因素共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2015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流出流量为1.47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5.0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分别占全球的9.9%和4.4%,流量位列全球第2位^[3]。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资,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其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流量为189.3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同比增长38.6%,是对全球投资流量增幅的2倍^[4]。可见,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浪潮掀起的过程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本文尝试从国家地缘距离的视角,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范围,探讨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也使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5],其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备受关注的话题^[6]。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流派,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东道国

税收政策、市场规模、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生产成本等^[7-9]。Meyer等^[10]用新兴公司战略管理的三大主流理论——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理论——来解释公司的FDI问题。制度理论从公司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解释公司对外投资策略发生转变的原因;考虑交易成本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提出区位优势是FDI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1],受区位优势影响,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常常能吸引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直接投资流入,而工业发达国家则有着超过平均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资源理论则关注利用公司在进行FDI时对不同地区所掌握的资源差异来解释投资资本的流向。国内相关研究中,Kang Y等^[12]认为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政治体制严格和经济相对自由的国家或地区投资;阎大颖^[13-14]发现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战略资产禀赋,经济制度质量等均对外资流向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张宏等^[15]从东道国资源禀赋、制度质量、宗教多元及其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等方面分析其对中国OFDI流量的影响;陈衍泰^[16]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考察了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和制度质量等的影响;冀相豹^[17]则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存在影响。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影响对外投资的各种因素中,除文化联系与差异是投资国与东道国相互作用的因素外,其他大都只是东道国自身的条件,并没有考量其他的相互关系因素。针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研究,陈虹等^[18]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本需求较多,中国对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投资潜力空间很大;姚战琪^[19]分析了对沿线直接投资的效率;郑蕾^[20]阐述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和产业

选择。已有研究为本文认识和理解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基本情况和格局提供了基础,本文在上述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提取出不同类型的距离因素,增进国家之间差异和相互关系的要素影响的研究,探讨它们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OFDI的作用。

在企业O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国家距离是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之一,它指示了国家之间在不同要素上的特征或者水平的差异^[21-23]。Ghemawat提出了文化、管理、地理和经济四个国家距离的维度,并以此解释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评估时产生国家间差异的原因^[24]。此外,还有学者从国家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制度距离,或者几种距离的结合^[25-27]等角度来探讨国家距离对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作用,但有关国家距离对于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结果却不相一致,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学者对距离的考量和计算方式、研究的区域范围以及对投资区位选择所采用的衡量指标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但大多数研究认同,国家距离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流量有着负向作用。一是地理距离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Ghemawat认为地理距离远,会增大运输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降低跨国企业的知识传递效率^[24],彭涛等的研究也实证确认了这一观点^[28]。二是文化距离对企业OFDI决策的干预^[29-30],殷华方等在探索文化距离对国际投资流向的影响时提出了S型曲线假说,认为文化距离同时影响“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两个方面,因而与国际投资流向有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31];而田晖等得出了文化距离总体上负向作用于双边的贸易投资量的研究结论,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别越大,对其贸易和直接投资越少^[32]。三是国家制度距离对公司在海外投资表现的作用,Chao等认为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国际多样性绩效^[33];Li Yong等测度了基于国家管理系统的制度距离和基于价值观和信仰等的文化距离对国际风险投资环境的影响^[22]。针对国家距离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沿线投资合作等关系的研究,陈衍泰从国家距离的视角,用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探讨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企业的选址问题^[34];谢孟军提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必须关注文化的影响。上述研究为本文理解国家距离的概念和度量提供了素材和基础,并为探寻国家距离与对外投资的关系提供了分类依据和研究方法的借鉴^[35]。本文将国家距离定义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政

治、经济、文化、知识、外交、全球连接等7个方面的差异程度或联系水平,并用国家地缘距离表示几大国家距离的综合得分。依据上述研究的主流观点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初始假设,认为不同类型的距离因素对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都是负向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发现,已有研究中有关国家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探索虽较为充实,但其对国家距离的描述尚不够全面,也缺乏比较各种类型的国家距离对于企业OFDI的作用机制、影响大小与差别。因此,本文将国家之间在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和与全球连接等7个方面的距离因素综合为国家地缘距离,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范围,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之间各种距离的存在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区位选择、发现着力点和制定政策措施等提供参考。

2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

“一带一路”向东连接亚太经济圈,向西沟通欧洲经济圈,中间联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非等区域,是一个开放、包容、普惠的经济合作倡议区域,并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36]。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37-38],将研究范围界定为蒙俄、东南亚11国、南亚8国、中亚5国、中东欧19国以及西亚北非19国六大地区,共64国(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民生产总值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普遍处于经济上升期,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步骤和方法如下:首先,建立各种距离变量及其指标体系,分析不同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可能影响;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各种国家距离的数值和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分析沿线国家与中国不同的距离关系的分布格局;最后,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考察和对比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以及不同类型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关系。

地理距离是指企业所属国家与东道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物理距离,本文采用首都距离和是否接壤两个指标来衡量。文化距离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国家
Tab.1 The regions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地区	国家
蒙俄	俄罗斯、蒙古
东南亚 11 国	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东帝汶、文莱、印度尼西亚
南亚 8 国	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尔代夫、阿富汗
中亚 5 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西亚北非 19 国	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卡塔尔、叙利亚、土耳其、埃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巴林
中东欧 19 国	乌克兰、波兰、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波黑、黑山、马其顿、摩尔多瓦、立陶宛、白俄罗斯

度理论数据测算^[39],由权力距离等五个不同的维度共同构成^[40]。经济距离是两国之间在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特征上的比较,通常用收入、通货膨胀、出口和进口等变量来测量国家间经济距离^[21,41],本文采用人均GDP、GDP通胀率、国际贸易的进口和出口来度量。政治距离体现了国家之间在政治稳定、政府特点等政治维度上的相似和差异,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政治稳定性指标和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两项来表征,其中,全球治理指标从话语权和责任等多个角度对国家的治理情况进行了量化^[42],清廉指数则体现了各国的政府运作效率和腐败情况^[43]。知识距离是国家之间在创造知识和创新方面能力的差异^[44],本文采用每百万居民的专利申请数量来表示。外交距离指国家之间在通过谈判、互访、缔结条约等途径进行往来时的亲疏程度,本文用国家

间的友好伙伴关系来表征。全球连接距离关注的是国家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之间的连接度,本文用国际人口迁移、国际旅游开支比重、互联网用户比例3个指标表示。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包含地理距离等在内的国家距离指标体系(表2)。

剔除数据缺失的国家,最终得到具有完整数据的34个国家。对多指标的距离用主成份分析法提取主成份并合成综合指标,其中,地理距离和政治距离各提取了1个主成份,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和全球连接距离均各自提取了2个主成份,见表3。

计算得到各种距离值后,用主成份分析法获得各种距离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指标,将综合指标得分值与中国企业对沿线OFDI金额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考察国家地缘距离与中国OFDI的相关关系。

为分别考察不同类型国家距离对中国OFDI的

表2 国家距离指标体系
Tab.2 Index system of national distances

变量	含义	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投资区位选择 LC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的投资	投资存量	OFDI、存量OFDI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地理距离 Geo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地理上位置关系	国家距离 共同边界	首都距离 CD 共同边界长度 BL	维基百科
文化距离 Cul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对个人主义、权威、性别角色和不确定性避免等态度的差异	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避免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对权力分配平等的期待程度 PD 社会对不确定性的容忍 UA 个人与集体融入程度 IG 不同性别的角色分配 MF	GEERT HOF-STEDE
经济距离 Eco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特征上的差异	通货膨胀 进口 出口	GDP通胀率 INFLATION 商品进口额 IMPORT 商品出口额 OUTPUT	世界银行
政治距离 Pol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清明上的差异	对政治清明的感知 政治稳定情况	清廉指数 COR 政治稳定性 STA	透明国际 世界银行
知识距离 Kno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创造和创新的差异	专利数量	居民专利申请量 PATENT	世界银行
外交距离 Dip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友好关系程度	国家友好伙伴关系	国家友好伙伴关系评分 PART	外交部
全球连接距离 GloCon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交流时的差异	人口流动 国际旅游开支 国际旅游收入 互联网使用	国际移民数量 MIG 国际旅游支出占进口的比重 TE 国际旅游收入占出口的比重 TI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 IU	世界银行

注:除专利、旅游收入和支出为2014年数据外,其余各指标均采用2015年数据。

表3 距离计算的主成份提取

Tab.3 The extracted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national distances

变量	政治距离主成份	变量	文化距离主成份		变量	经济距离主成份		变量	全球连接距离主成份	
			1	2		1	2		1	2
STA	0.809	PD	0.867	0.058	OUTPORT	0.964	0.079	TI	0.862	-0.027
COR	0.809	IG	0.747	0.140	IMPORT	0.949	0.157	TE	0.620	0.017
CD	0.822	MF	0.651	-0.318	INFLATION	0.026	0.879	MIG	-0.371	0.788
BL	0.822	UA	0.055	0.951	INCOME	-0.468	0.529	IU	-0.468	-0.651

作用,建立回归方程式如下:

$$\ln LC_{ij} = \beta_0 + \beta_1 \cdot \ln Eco_{ij} + \beta_2 \cdot \ln Pol_{ij} + \beta_3 \cdot \ln Cul_{ij} + \beta_4 \cdot \ln Kno_{ij} + \beta_5 \cdot \ln GloCon_{ij} + \beta_6 \cdot \ln Geo_{ij} + \beta_7 \cdot \ln Dip_{ij} + \varepsilon_{ij}$$

式中: i 表示第*i*个国家; j 代表中国; β_0 为常数项; β_1, \dots, β_7 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Eco_{ij} 为*i*国与中国间的经济距离; Pol_{ij} 为*i*国与中国间的政治距离; Cul_{ij} 为*i*国与中国间的文化距离; Kno_{ij} 为*i*国与中国间的知识距离; $GloCon_{ij}$ 为*i*国与中国间的全球连接距离; Geo_{ij} 为*i*国与中国间的地理距离; Dip_{ij} 为*i*国与中国间的外交距离; ε_{ij} 为随机扰动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

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89.29亿美元,同比增长38.6%,远高于对各大洲投资的增速,更是世界平均增速的两倍有余(表4)。中国对沿线投资量占对世界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7%增至2015年的13%,增长势头迅猛(图1)。

表4 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量金额分布

Tab.4 The OFDI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2015

投资地区	投资金额(亿美元)	同比(%)	比重(%)
亚洲	1 083.70	27.5	74.4
欧洲	71.2	-34.3	4.9
拉丁美洲	126.1	19.6	8.6
北美洲	107.2	16.4	7.4
大洋洲	38.7	-10.7	2.7
非洲	29.8	-7	2
“一带一路”沿线	189.29	38.6	13
世界	1 456.70	18.3	100

数据来源: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图1同。

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的覆盖率高。从2015年底中国企业OFDI在境外覆盖的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对沿线64个国家中的63个(除不丹)都有投资,覆盖率达到98.4%,远超对世界80.3%的投资覆盖率,且高于对各大洲的投资覆盖率(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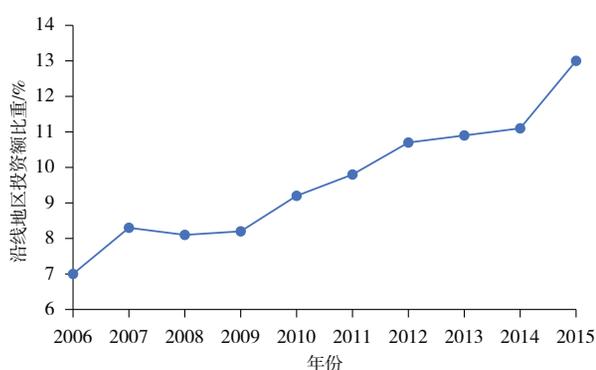


图1 2006—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比重的变化
Fig.1 Change of Chinese OFDI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6 to 2015

表5 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境外覆盖情况

Tab.5 The cover rate of Chinese overseas companies at the end of 2015

地区	国家/地区数(个)	中国企业覆盖的国家/地区数(个)	覆盖率(%)
亚洲	48	46	97.9
欧洲	49	43	87.8
非洲	60	51	85.0
北美洲	4	3	75.0
拉丁美洲	49	33	67.3
大洋洲	24	12	50.0
“一带一路”沿线	64	63	98.4
世界	234	188	80.3

注:覆盖率为中国境外企业覆盖国家数量与国家地区总数的比率。

从在“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区位选择来看,中国企业对沿线地区OFDI的地区分布有较大差别。

地区分异方面,不论是投资额还是投资企业数目,都表现出显著且较为一致的地域分异规律(图2)。总体上来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和力度最大,增长速度也最快;其次为蒙俄和西亚北非地区,随后是中亚和南亚地区,而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规模和力度最小(图3)。

国家尺度的差异方面,中国企业对沿线直接投资存量总额前十位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阿联酋、缅甸、巴基斯坦、印度、蒙古,投资企业数目位列前十位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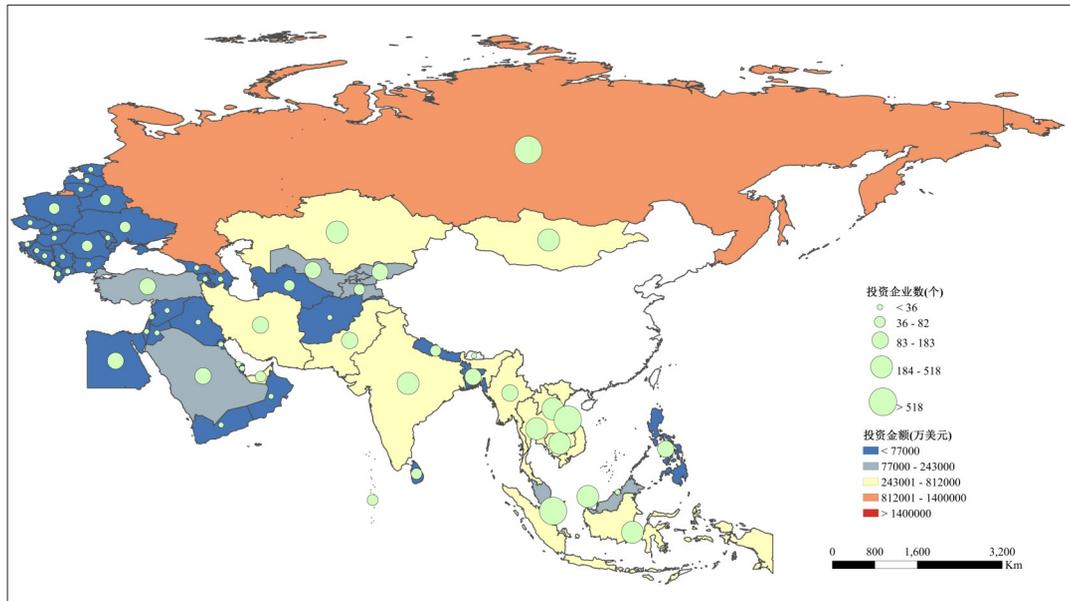


图2 2015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数目和存量金额分布
 Fig.2 The Chinese OFDI and overseas companies distribu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15

依次是俄罗斯、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度、马来西亚、蒙古,上述国家大都位于中国周边,且与中国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而中国企业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如中东欧的立陶宛、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西亚北非的黎巴嫩等国,以及南亚的不丹、马尔代夫等国则投资力度较小。

投资企业数目和投资总金额的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较为一致的格局,但也有个别国家有所差异。相对于较高的投资额来说,投资企业数较少的国家有阿富汗、阿联酋;相对于较多的投资企业数目来说,投资总额较低的国家有孟加拉国、乌克兰、马尔代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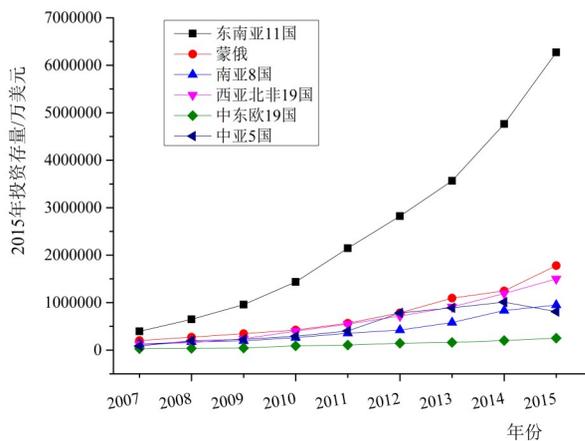


图3 2007—2015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投资存量的变化

Fig.3 Change of Chinese companies' investment stock by reg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7-2015

3.2 “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的国家距离和地缘关系

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不同国家距离方面有着不同的距离关系(表6)。

地理距离上,中东欧国家以及埃及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最远,而东南亚和南亚的国家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距离上,中国与以色列、俄罗斯以及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文化距离最远,而东南亚、南亚国家与中国文化距离较为相近。经济距离方面,与中国经济距离较远的国家有西亚北非地区的黎巴嫩、约旦、埃及,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不丹和尼泊尔等,而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捷克等国与中国的经济距离较近。就各国与中国的政治距离来说,中东欧国家以及新加坡、不丹、以色列、约旦等国与中国的政治距离相对较远,而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埃及、土耳其与中国政治距离较近。知识距离方面,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知识距离最近,其次为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而其余国家与中国的知识距离相距均较远。外交距离上,不丹和大多数中东欧、西亚北非国家与中国外交距离较远,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等国与中国外交距离最近。全球连接距离上,中国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乌克兰的距离最远,中东欧国家、孟加拉国、尼泊尔以及埃及、印尼等国与中国全球连接距离相对较近。

依据本文的初始假设,各种类型的距离因素对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都是负向

表 6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与中国距离的标准化结果

Tab.6 The standardized result of national dista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国家	地理距离	文化距离	经济距离	政治距离	全球连接距离	知识距离	外交距离
越南	0	0	0.714631	0.122612	0.086278	0.979769	0.142857
孟加拉国	0.150010	0.024014	0.879701	0.244861	0.006420	0.998172	0.500000
印度尼西亚	0.547926	0.056722	0.754840	0.010249	0.032008	0.970837	0.357143
新加坡	0.413661	0.058327	0	1	0.115984	0.945871	0.428571
菲律宾	0.118350	0.103019	0.861986	0.035466	0.066667	0.986125	0.428571
黎巴嫩	0.865827	0.119457	1	0.195430	0.083255	1	1
马来西亚	0.389699	0.121198	0.735273	0.268357	0.125312	0.943794	0.357143
印度	0.225534	0.145590	0.479454	0.016847	0.383865	0.499834	0.214286
尼泊尔	0.150774	0.176003	0.918256	0.199614	0.010990	1	0.714286
阿尔巴尼亚	0.993409	0.177731	0.959467	0.028159	0.096104	0.999585	0.857143
斯里兰卡	0.537931	0.246459	0.943228	0	0.070339	1	0.214286
约旦	0.880231	0.256032	0.957039	0.314310	0.207374	0.998338	1
泰国	0.199284	0.270683	0.700835	0.017550	0.272619	0.958209	0.142857
沙特阿拉伯	0.797469	0.280959	0.600763	0.294022	0.861762	0.972915	0.357143
埃及	0.968930	0.303518	0.901684	0.025411	0.033693	0.968760	0.357143
科威特	0.728605	0.324962	0.686444	0.241965	0.157204	1	1
不丹	0.104524	0.325362	0.946280	0.591243	0.081185	1	1
塞尔维亚	0.949173	0.347435	0.958561	0.066102	0	0.991609	0.428571
巴基斯坦	0.296219	0.357792	0.886093	0.171575	0.220058	0.993935	0.071429
克罗地亚	0.986251	0.361440	0.94808	0.296468	0.025523	0.992938	0.714286
保加利亚	0.934439	0.392076	0.964802	0.082138	0.029545	0.990944	0.642857
罗马尼亚	0.881474	0.412148	0.913998	0.187264	0.066625	0.960452	0.642857
土耳其	0.840171	0.457902	0.759964	0.105238	0.191020	0.802011	1
斯洛文尼亚	1	0.467900	0.811740	0.486113	0.048421	1	1
乌克兰	0.770994	0.483378	0.890744	0.220063	0.366707	0.897931	0.428571
斯洛伐克	0.946358	0.484362	0.810598	0.304193	0.040691	0.991235	1
俄罗斯联邦	0.584407	0.560832	0.636127	0.161528	1	0	0
捷克	0.953092	0.580150	0.689321	0.405745	0.022887	0.962197	1
波兰	0.859636	0.582476	0.689350	0.525787	0.070562	0.836283	0.428571
爱沙尼亚	0.755386	0.773153	0.881189	0.683037	0.033822	0.998172	1
立陶宛	0.790675	0.832271	0.900794	0.501934	0.059333	0.994890	1
拉脱维亚	0.782759	0.923918	0.926054	0.375130	0.038146	0.995721	1
匈牙利	0.931635	0.942893	0.829163	0.299629	0.028524	0.977318	0.785714
以色列	0.894383	1	0.574835	0.487695	0.068119	0.953265	1

的,亦即,与中国各种类型的国家距离越远,中国企业越不倾向于投资设厂。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与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各种类型距离相对较远,中国企业在中东欧的投资也较少;而东南亚、南亚的多数国家与中国的国家距离大多较近,吸收的中国企业的投资也较多。因此,定性层面的分析基本符合本文的初始假设。但是各种类型的国家距离究竟如何作用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选择,还需通过定量的分析来进行判断和解读。

3.3 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外向投资的影响

国家地缘距离与中国企业的投资量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定量计算得到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指标,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OFDI 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相关系数为-0.366。表明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与中国的国家地缘距离越远的国家地区,中国对其投

资量越小。

表 7 国家间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回归结果

Tab.7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national distanc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OFDI

变量	标准化系数 Beta	T	Sig.
<i>Eco</i>	-0.532	-4.029	0.000
<i>Cul</i>	-0.014	-0.091	0.928
<i>Pol</i>	-0.208	-1.422	0.167
<i>Geo</i>	-0.080	-0.475	0.639
<i>GloCon</i>	0.027	0.209	0.836
<i>Kno</i>	-0.033	-0.242	0.810
<i>Dip</i>	-0.375	-2.177	0.039

不同类型的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作用机制有所差异。从回归结果可知,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对中国企业外向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文化、政治、地理、知识距离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全球连接距离则表现为不显著的微弱的正向作用。

经济距离显示的是消费者财富和收入以及产品(服务)成本与质量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在本文的回归结果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距离表现为与OFDI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系数为-0.532, $p < 0.01$),证实了经济距离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流向的影响作用较强,中国企业倾向于将资本投到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特征相差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如与中国经济距离较小的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这主要是由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济距离越小,两个国家消费者的需求越相似,顾客偏好也越相近,因此选择经济水平相近的东道国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扩张。

外交距离对于中国企业OFDI也有着显著($p < 0.05$)的负相关关系(系数-0.375),即与中国外交距离越小的国家,中国企业越倾向于投资设厂,如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等国。这说明国家意志层面的亲密关系对企业“走出去”有着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助于缩小国家外交距离,更好地搭建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从而推动企业对外投资。

政治距离体现了国家之间在政治稳定、政府特点等政治维度上的相似和差异。一般认为,政治距离小的国家间政府稳定性和管理特点等较为相似,有利于企业开展生产和开辟业务,因此本文的原假设为较小的政治距离有利于减小企业对外投资的阻力,推动企业投资。但是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政治距离虽然对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呈现一定的负向作用,系数为-0.208,但是其显著性不高,负向作用并不显著。

根据成本学派的理论,地理距离远会增大运输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降低跨国企业的知识传递效率;地理距离近,则有利于企业东道国的销售绩效提升。而在回归结果中,地理距离对于中国OFDI的作用表现为不显著的负相关(系数-0.08)。对此结果,本文认为随着交通和相关科技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的作用已经有所减弱。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知识距离小,一般认为投资过程中需要投入的知识技术成本相对较低;文化距离存在的作用是,在不确定性规避等文化距离维度方面各国消费者行为和员工行为等都存在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小则有利于企业选择适合的东道国以及带来东道国机构经营活动更好的绩效。而在本文的实证结果中,知识距离和文化距离系数较小(文化距离系数-0.14,知识距离系数

-0.033),且不显著,说明相较之下,文化距离和知识距离对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对当地的技术知识和劳动力等的依赖不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较多地采用来自母国的知识技术和员工等,由此使得知识距离和文化距离对OFDI流向作用的显著性不高。

全球连接距离的回归结果表现为不显著的正面作用(系数0.027),与初始假设不符。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的全球连接指标较高,而与中国全球连接距离较大的国家同其他国家的连接大都不够紧密,因此,其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大的开发潜力,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因而全球连接距离对中国OFDI起到了微弱的正面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不同维度的国家距离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已有文献中关于综合性国家距离作用效果的研究仍较少,特别是比较不同国家距离对OFDI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差异的研究更少。本文将国家之间在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和与全球连接等方面的距离因素进行综合,建立国家地缘距离的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相关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投资关系为例,探讨国家地缘距离及其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总额和企业数目的地区分布有较大差别。地区尺度上,投资规模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东南亚、蒙俄、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中东欧;国家尺度上,中国企业对沿线直接投资前5的国家依次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投资企业数目前5位的国家依次是俄罗斯、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而中国企业对中东欧、西亚北方和南亚的部分国家则投资力度较小。②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国家与中国的国家距离大多较近,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的国家距离普遍较大。③国家地缘距离与中国OFDI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④不同类型的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作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距离小的地方投资;政治距离和地理距离呈现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知

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负向作用更为微弱;全球连接距离则有不显著的很弱的正向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应首先选择国家地缘距离较小的国家作为重点,特别是外交和经济距离较小的国家,以节约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针对各种距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当采取差异化的投资方式和策略,克服国家距离带来的阻力。结合本文研究,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①通过各种距离的计算,找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利益契合点,合理配置中国企业OFDI的资本流动,防止企业盲目扎堆投资,避免过度集中,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②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缩短与沿线国家的各种距离,尤其是缩小外交距离,以降低投资成本,如通过加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对外投资政策等,在融资保险、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等方面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优良的投资条件和环境;③利用国家距离的影响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优化评估,做好对投资环境的调查和风险防范,建造企业在沿线直接投资的信息沟通平台和风险预警系统;④利用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平台,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扩大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与签署,增强“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本文在国家距离的指标体系构建上仍需继续完善,在目前已有的各种距离因素基础上可考虑增加其他可能的距离因素,考察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 “一带一路”经济地理革命与共赢主义时代[N]. 光明日报, 2015-07-16(11).
- [2] 杜德斌, 马亚华. “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J]. 地理研究, 2015, 34(6): 1 005 - 1 014.
- [3] 钱志清, 许娜. 全球直接投资趋势及投资者“国籍”带来的政策挑战——解读联合国贸发组织《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J]. 国际经济合作, 2016(7): 4 - 12.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 [5] 王群英.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J]. 经济地理, 2001, 21(2): 174 - 176.
- [6] 肖文, 周君芝.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能力的实证检验[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44(1): 184 - 196.
- [7] 李凝, 胡日东.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 基于制度的视角[J]. 经济地理, 2011, 31(6): 910 - 914.
- [8] Quer D, Claver E, Rienda L. Political risk, cultural dist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rge Chinese firm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4): 1 - 16.
- [9] Hu H W, Cui 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publicly listed firms from China: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3, 23(4): 750 - 760.
- [10] Meyer K E, Peng M W. Probing theoretically in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ransactions,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5, 36(6): 600 - 621.
- [11] Dunning J H.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73, 25(3): 289 - 336.
- [12] Kang Y, Jiang F. 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 45 - 53.
- [13] 阎大颖, 洪俊杰, 任兵.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基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09, 12(6): 135 - 142.
- [14] 阎大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7): 128 - 135.
- [15] 张宏, 王建. 东道国区位因素与中国OFDI关系研究——基于分量回归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6): 151 - 160.
- [16] 陈衍泰, 李欠强, 王丽, 等. 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J]. 科研管理, 2016, 37(3): 73 - 80.
- [17] 冀相豹, 葛顺奇. 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微观企业为分析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3): 76 - 85.
- [18] 陈虹, 杨成玉.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0): 4 - 13.
- [19] 姚战琪.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区位选择[J]. 经济纵横, 2016(12): 59 - 66.
- [20] 郑蕾, 刘志高.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63 - 570.
- [21] Berry H, Guillén M F, Zhou 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cross-national dist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9): 1 460 - 1 480.
- [22] Li Y, Vertinsky I B, Li J. National distanc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9(4): 471 - 489.
- [23] Zaheer S, Schomaker M S, Nachum L. Distance without direction: Restoring credibility to a much-loved construc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1): 18 - 27.
- [24] Ghemawat P. Distance still matters. The hard reality of global-expans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1, 79(8): 137 - 40, 142 - 7, 162.
- [25] 史伟, 李申禹, 陈信康. 国家距离对跨国零售企业东道国选择的影响[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3): 117 - 127.

- [26] 高国伟. 国家间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J]. 经济评论, 2010(5):24-32.
- [27] 许和连, 张萌, 吴钢. 文化差异、地理距离与主要投资国在我国的FDI空间分布格局[J]. 经济地理, 2012, 32(8):31-35.
- [28] 彭涛, 黄福广, 熊凌云. 地理邻近对风险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J]. 管理科学, 2015(4):46-58.
- [29] 綦建红, 李丽, 杨丽. 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12):137-147.
- [30]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411-432.
- [31] 殷华方, 鲁明泓. 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 S型曲线假说[J]. 南方经济, 2011, 29(1):26-38.
- [32] 田晖, 蒋辰春. 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3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3):45-52.
- [33] Chao C H, Kumar V.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1):93-103.
- [34] 陈衍泰, 范彦成, 李欠强.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产能合作中东道国选址研究——基于国家距离的视角[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5(3):241-249.
- [35] 谢孟军. 文化能否引致出口: “一带一路”的经验数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1):3-13.
- [36]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Z]. 北京: 外交出版社, 2015.
- [37] 公丕萍, 宋周莺, 刘卫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571-580.
- [38] 邹嘉龄, 刘春腊, 尹国庆, 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598-605.
- [39] 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Third Edition- Software for the Mind, Third Edition [M]. New York: Business Expert Press, 2010.
- [40] 慈玉鹏. 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J]. 管理学家: 实践版, 2010(12):48-56.
- [41] Caves R 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2] 万伦来, 高翔. 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经验数据[J]. 国际经贸探索, 2014, 30(5):39-48.
- [43] 过勇, 宋伟. 清廉指数的腐败测评方法与局限性[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5):151-160.
- [44] Nachum L, Zaheer S, Gross S. Does It Matter Where Countries Are? Proximity to Knowledge, Markets and Resources, and Mne Location Choice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8, 54(7):1252-1265.

(上接第58页)

- [17] 杨森平, 唐芬芬, 吴翔.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的倒U型关系研究[J]. 经济与金融管理, 2015, 27(11):3-10.
- [18] 尤鑫. 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人口发展变化研究[J]. 地理科学, 2015, 35(3):268-274.
- [19] Yuzhe Wu, Jiaojiao Luo, Xiaoling Zhang, Martin Skitmore. Urban growth dilemmas and solutions in China: Looking forward to 2030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56):42-51.
- [20] 杨传开, 宁越敏.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J]. 地理研究, 2015, 34(8):1492-1506.
- [21] 刘涛, 齐元静, 曹广忠.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J]. 地理学报, 2015, 70(4):567-581.
- [22] 张耀军, 岑俏. 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研究, 2014, 38(5):54-70.
- [23] 陈贝贝. 半城市化地区的识别方法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1):210-220.
- [24] 刘江, 崔胜辉, 唐立娜, 等. 半城市化地区住区形态及空间分布特征: 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5):579-585.
- [25] 刘盛和, 张擎. 杭州市半城市化地区空间分布变化[J]. 地理研究, 2008, 27(5):982-992.
- [26] Leaf M. A tale of two villages: globalization and periurban change in China and Vietnam [J]. Cities, 2002, 19(1):23-31.
- [27] Pahl R E. Urbs in Rure: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in Hertfordshire [M].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5:2-20.
- [28] Webster D. On the edge: Shaping the future of periurban East Asia [M].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2002.
- [29] 陈雪明. 美国城市化和郊区化历史回顾及对中国城市的展望[J]. 国外城市规划, 2003, 18(1):51-56.
- [30] 何重达. 浅析美国和中国城市郊区化机制[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09(9):32-36.
- [31] 冯健, 周一星, 王晓光, 等. 1990年代北京郊区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 城市规划, 2004(3):13-29.
- [32] 刘汉初, 卢明华, 刘成. 山西省县域人口半城市化的空间格局研究[J]. 经济地理, 2015, 35(1):21-28.
- [33] Liu Xiang, Cao Guangzhong, Liu Tao, et al. Semi-urbanization and evolving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sights from the 2000 to 2010 national censuses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 26(11):1626-1642.
- [34] 苑韶峰, 朱从谋, 杨丽霞, 等. 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时空耦合分析——以浙江省67县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3):144-151.
- [35] 杜书云, 牛文涛. 中国半城镇化困局的成因及破解机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55(3):75-83.
- [36]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